

摘要

本論文以1872年朱偁、任薰《博古花卉圖四屏》作為主要材料，首先針對全形拓的目標與視覺效果進行分析，指明全形拓與既有圖繪的關鍵差異在於拓片能夠呈現器面的質感，而《博古花卉圖四屏》拓片的選擇說明對於器物形象的關注。其次梳理全形拓的製作方式，注意到全形拓其實相當倚賴繪製的草圖，而透過分析《博古花卉圖四屏》採用的拓片可以注意到不合乎器物結構的現象，說明此套作品採用翻刻拓片。最後聚焦於朱偁與任薰兩位畫家補繪花卉，透過補繪的物象位置與落款方式，可以知道此套作品是在任薰完成後，畫主蘭生再委託朱偁補繪而成，而《博古花卉圖四屏》此類作品之所以在上海盛行，與上海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成為金石收藏與繪畫活動的中心關係密切。

本論文檢討前人研究將全形拓定位為機械複製器物的技術，關注全形拓與圖繪之間的關係，並透過《博古花卉圖四屏》結合翻刻的全形拓與職業畫家補繪的簡筆花卉，說明此類作品不再只侷限於特定的金石藏家群體，已經成為完全職業化的作品。